

20世纪上半叶知识界对考古学与金石学关系的认识

Knowledg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aeology and Epigraph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肖 宇

Xiao Yu

(常州博物馆, 常州, 213022)

(Changzhou Museum, Changzhou, 213022)

内容提要: 考古学与金石学的关系问题牵涉甚广而又至关重要, 长期议而不决。特定学术语境中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考古学和金石学既存在亲缘关系, 又有差异。同时, 在中国考古学创建的具体实践中, 已有学人立足于研究方法与学科发展, 强调考古学的独立性, 而与金石学立异。关于考古学与金石学关系的认知结果, 是不同情境下中国考古学本体论的表达形式。而对这一认知过程的爬梳与分析, 则构成中国考古学史研究的一种路径。

关键词: 近代学人 考古学 金石学 考古学史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aeology and epigraphy is really critical to this field and has been discussed for a long time. The mainstream view of history in a specific academic context not only holds that archaeology and epigraphy are related, but also recogniz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t the same time, during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archaeology creation, some scholars, based on research methods and subject development, emphasized the independence of archaeology, for i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epigraphy. The cognitive resul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aeology and epigraphy is the expression form of Chinese archaeology ontology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The analysis of this cognitive process constitutes a path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aeological history.

Key Words: Modern scholars; archaeology; epigraphy; history of archaeology

对于考古学与金石学的关系, 学术界历来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聚讼纷纭, 并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形成讨论高潮^[1]。对于考古学与金石学关系的讨论, 可远溯至中国考古学肇始时期——20世纪上半

叶。本文旨在通过文本剖析, 厘清20世纪上半叶知识界对中国考古学与金石学关系的认知, 以深化对中国考古学史、中国考古学本体的理解, 并提示这一议题在学术史回顾和理论构建方面的重要价值。

一、一种认知史：讨论考古学与金石学关系的意义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学在中国发展逾90年^[2]，作为20世纪发展最迅猛的一门学科，中国考古学经过“黄金时期”^[3]大规模的田野工作后，考古学理论与考古学史研究则远远落后，有学者将这种情形称之为“超前式发展”^[4]。相对于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对学科本体的研究略显乏力不济，正如张光直所言：“‘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考古活动中没有什么地位。”^[5]这种有术而乏道的现象似乎在中国各学科中并不鲜见，但学科的发展必定要经过对自身的“突围”——学科理论的构建、解构与再构建。这种“突围”的前提是学科史研究，即对学科发展过程与理论的充分揭示，使中国考古学在清晰的学术坐标中以更加自觉的姿态走向未来^[6]。

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由于学科理论的外来性、学科产生背景的特殊性、长期的旧学传统、研究对象与史学的部分重叠，中国考古学史附丽有更大的张力，只有中国传统学术背景才能孕育中国考古学，也只有重返中国传统学术语境才能理解中国考古学。李济为《中国考古小史》作序时，开篇直言：“严格的考古学在我国虽是很近的一种发展，旧学中却有它很厚的根基。”^[7]问题的症结恰恰又在于此，当今中国考古学与中国传统学术断裂甚至对立^[8]。毋庸置疑，由于研究对象的相近，传统金石学与中国考古学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二者的关联性在中国考古学史与中国考古学理论中应如何建立，无疑又是一个关键问题。换言之，在中国考古学史的叙述过程中缺乏对金石学的深刻描述，在中国考古学理论建设过程中缺乏对金石学的恰当定位，中国考古学发展过程中缺乏对金石学传统的充分吸纳。

考古学与金石学关系的认知史，既是窥探与理解中国考古学史的关键议题，亦可能成为中国考古学反思与革新的源泉。一方面，金石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固有概念，将其与考古学并置考量是中国学

术语境的必然议题，便于从中国学术的立场展开思考。另一方面，考古学史不止于技术史、发现史和研究史，还包括潜在更为深刻的层面——思想史^[9]，这为考古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折衷新旧：20世纪上半叶知识界的主流认识

20世纪首篇专述中国考古学史的文章为梁启超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原为1926年梁启超为欢迎万国考古学会会长来访而做的演讲。梁启超认为，“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种专门学问始自北宋，印刷术与拓印术对于“考古学”的发展大有帮助。但是，自南宋中叶降至元明两代，学风丕变，学者趋重玄谈，“考古学”式微，直至乾隆中期以后才有“很猛烈的进步”。梁启超所言“考古学”实为“考古之学”，即研究古物之学问，以致全篇皆以“考古学”代称金石学。如此，近代考古学自然为金石学发展的产物，只是未经充分发展。梁启超文中所言当世“考古学家”——罗振玉、王国维及马衡，也大抵是以旧学见长的学者，兼又引入出土材料治学。

同时，梁启超敏锐察觉到“中国考古学”的新旧变数：“虽然所用的方法，不过是中国旧有的老法子，在学问上的贡献已经不少了……不过据我看来，考古学还是很幼稚。”^[10]此外，梁启超还指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发掘和方法进步。第一个方向是“发掘”，尤其强调中国学者自己发掘，但并未强调发掘方法的科学性，意在“将来所得的古物一定比今日还多几十百倍”^[11]。第二个方向是“方法进步”，一方面为“旧方法的改良”，不光通过器物上花纹与文字断代，希望能在器物材质、形状及色泽上寻出标准，以遽定年代，这恰与考古类型学有些许暗合。这种巧妙的暗合似乎代表着近代学人对金石学变革的远瞻。另一方面为“新方法的引用”，即援求西方地质学与人类学。

“梁启超作为学界领袖，他对考古学的这些认识，实际上代表了当时知识界大多数人对考古学的

认识水平。”^[12]并对此后考古学史著述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卫聚贤、阎文儒的论述中均可窥见。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国科学考古学得以生长的载体,“史语所”领导人傅斯年是取得这一切成就的决定性人物。^[13]因而,傅斯年对考古学与金石学关系的看法尤显重要。傅斯年在1929年所做讲演《考古学的新方法》透露出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1928年,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明确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科学”。这一著名主张成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核心理念,他对考古学的定位正是基于这一史学思想。“考古学是史学的一部分,这个部分与其他部分不同,因其与自然界有关……所以考古学在史学当中是一独异的部分。”^[14]考古学的效用正是为史学提供史料,傅斯年甚至认为除古物外没有其他的東西能作为可靠的史料。这样我们便可理解,《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为何将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皆归属于历史范畴。

傅斯年将“中国考古学”的产生定于宋代,指出“考古学”的古今之异。“我国自宋以来,就有考古学的事情发生,但是没有利用到历史上去。”^[15]利用考古学研究古史,是在疑古思潮背景下涌现的新考古学,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新旧之分。同时,傅斯年又提出了考古学的中外之别,“中国人考古的旧方法,都是用文字做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外国人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做标准,故能得整个文化意义”^[16]。傅斯年对考古学古今中外分野的辨识实属不易,其时中国考古学恰逢古今中外的交汇点,中外之别相对清晰,但古今之别直至今日仍显暧昧。

1929年,蔡元培在《安阳考古报告(第一期)》序言中开宗明义:“考古学在中国不是一个新学问。宋朝人的中国古代文字器物之研究以及这一线上之目录学,都有很大的贡献。”^[17]在蔡元培眼中考古学并非纯粹的舶来学科,并提醒当下考古学研究者不可忽视“古代文字器物学”的传统与成就。

蔡元培指出:“近几百年中,世界为自然科学的所动荡,已经改了一个形势,前代的典型自不尽适合现代的要求。”^[18]要推动中国考古学发展,需扩充其科学凭借。而安阳殷墟的发掘,正表明中国考古学的方向性转变。不囿于一隅的文字或器物考订,而关注殷墟的整体面貌,为解决其他问题张本。重视实物证据,由实物产生问题,因问题求证实物,更趋近科学。

首先对中国考古学进行系统总结而著史的是卫聚贤,1933年出版《中国考古小史》,后因小史略古详今,故1937年又编著《中国考古学史》。《中国考古小史》将中国考古学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春秋战国为宝贵期、汉至唐为祥瑞期(除梁)、宋至近代为研究期(除元、明)、现在为发掘期。《中国考古学史》先述“周至唐的古物与政治的关系”,继述“东周至唐的考古学者”“宋至明的考古”“清至现在的考古”。由此而知,卫聚贤眼中的中国考古学从春秋延续至今,春秋以降对古物的搜集、宋代以降的金石学、清代以降的古器物学和近代中国考古学一脉相承,亦即金石学为中国考古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环。

卫聚贤又明确地把考古学与金石学区分开来,“前人研究古物,可说是一种‘金石学’,或‘古器物学’。现代的考古,即西人所谓‘锄头考古学’,注重在发掘”^[19]。《中国考古学史》续《中国考古小史》而出,书名以“考古学”取代了五年前的“考古”一词。《中国考古学史》绪论中言明其中差别:“懂的古物也可叫做考古,不能目为考古学,因考古所以成学,是要亲自发掘,以观其在地内保存的情形,并与其他物共存的关系,都要详为记录,并绘图照像。”^[20]二者的差别在于:对古物的寻访与研究为“考古”,对遗址的科学发掘为“考古学”。以此反观《中国考古小史》可知:考古包括金石学、考古学,金石学发展为考古学。但在《中国考古学史》中,除绪论中区分“考古”与“考古学”,其余则含糊混同,一概以“考古”一词统而称之,所以《中国考古学史》实为“中国考古史”。若卫聚贤眼中“考古”包括“考古学”,

则《中国考古学史》在内容上逻辑可通，但书名与内容确有“名不副实”之嫌。

阎文儒所著《中国考古学史》，成书于40年代^[21]，其叙事框架基本承续于卫聚贤，亦由春秋述起，迄至20世纪上半叶。“根据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历史的科学，就是考古学……我们考古学史的范围，既不限于旧日的金石学，也不限于近百年来来的发掘报告，历代对物质文化遗存的认识和重视、收搜和保护，也都应列入考古学史的范围以内。”^[22]阎文儒以研究对象来界定考古学，可知阎文儒的“考古学”与卫聚贤的“考古”同义，所以金石学与近代中国考古学同属“考古学”，金石学与近代考古学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

对于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向，阎文儒虽未专门讨论，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考古学”章节中有所涉及。阎文儒认为，安特生、桑志华及鸟居龙藏等人的考古与研究活动，将西方考古学知识传入中国，因而刺激了中国从宋代沿袭而来的金石学、古器物学的发展，罗振玉、王国维在传统金石学基础上引入西方考古学研究方法，李济则在西方考古学基础上“配合”传统金石学。

三、隔膜与标新：学术情境中的认知差异

上文胪陈20世纪上半叶梁启超、傅斯年、蔡元培、卫聚贤和阎文儒对考古学与金石学关系的论述，有其认识共性。其一，强调发掘是区别传统金石学与近代考古学的标准，亲自发掘被视作考古学的时代特征。其二，重视实物证据，尤其是在上古史研究领域，对实物资料的倚重代替了文献考释，考古学成为扩充史料的重要途径。其三，突出整体研究，有别于金石学对器物或文字的孤立考释，考古学是对遗址整体面貌的揭示。其四，对于“考古学”与“金石学”的概念虽有区分，但这种概念辨识并非清晰而深刻的，在具体叙述中时有混同。其五，将考古学与金石学作为整体对待，强调其中的关联性，认为二者间存在承续发展关系。梁启超为学界耆老，蔡元培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是

“史语所”的实际掌舵者，卫聚贤所撰《中国考古学史》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虽不高，但屡次再版，流传颇广。他们的认识实际上代表着学界的主流观点与时代认知共性，可扼要归结为：一方面认为考古学和金石学之间存在继承发展关系，另一方面也觉察到考古学与金石学存在显著时代差异。

梁启超、傅斯年及蔡元培等学人对考古学与金石学关系的认识，源于特定学术情境。这种复杂多元的学术情境，至少包含相互交织的四重线索。其一，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疑古运动”影响甚巨，由文献钩玄拼合而成的古史体系轰然崩塌，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数次坦言，重建古史需日后由中国考古学担纲。其二，西方学人在华考古，客观上推动了考古学在知识界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基于考古发现而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强化了国人古史重建的迫切性。其三，清季以来，随着“创新史学”的诉求与努力，留学生译介西方考古学知识^[23]，并对新史学产生了一定影响^[24]。其四，殷墟甲骨、居延汉简等文献材料的出土，将金石学研究再次推向高峰，一定程度上“证明”这一传统学问在面对新出土材料和新研究对象时，其研究路径仍具有有效性。因而，考古学成为新锐学人眼中革新史学、拓宽视野、重建古史所必须倚助的学科。无须讳言，梁启超、傅斯年等学人对考古学具体知识的了解是碎片化的，遑论科学考古实践，其言论更多是基于当时学术目的、已有知识体系对创建中国考古学的构想与远瞻。

值得关注的是李济对考古学与金石学关系的认识嬗变。李济在1930年指出考古学与金石学的区别，唯论述中有含糊之处，1931年转而认为考古学是金石学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观点与梁启超、傅斯年等学人看法相似，属于当时的主流认识。1934年李济一改先前看法，强调中国考古学源于西方，开启了20世纪下半叶主流认识的先声^[25]。

李济对考古学与金石学关系的认知转变颇值得思考，蕴意深刻。与梁启超、傅斯年等学人不同，李济负笈哈佛期间修习过“希腊考古学”“埃及考古”等课程^[26]，是殷墟发掘的实际领导者，熟稔考古学

原理,这在其类型学、地层学实践中可见一斑^[27]。如果说梁启超、傅斯年等学人是史学界对考古学的倡导者,李济无疑是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开创者,因而李济更关注考古学与金石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就研究对象而言,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已为史学界的共识,尤其是在“疑古运动”的刺激和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倡导下。在近代考古学出现之前,金石学是唯一研究过去遗物的专门学问^[28]。就研究目的而言,中国考古学产生伊始便具有明显的史学倾向^[29],李济亦以古史重建为己任,甚至主张考古学的责任便是搜集与整理历史材料供史家采用^[30]。就研究方法而论,考古学与金石学致知取径各异,这种方法论上的分野,在中国考古学蹒跚学步时,传统学人确难把握。二重证据法仍不脱由文献到文献的研究路数,只是援用出土文献,传统学者虽有由书斋到田野的尝试,但缺乏有效的田野发

掘技术与科学理念,终究无法将纯粹的出土器物纳入述史畛域。其时,正值中国考古学葳蕤发生之际,姑且不论一般大众的态度^[31],知识界对考古学尚存隔膜,在多重学术背景的交织中,史界学人对创建中国考古学多有构想与远瞻,其中的隔义附会无可厚非,而在创建中国考古学具体实践中的李济,则从学科方法论立场上揭橥考古学与金石学的区别,为科学考古学之发展开辟道路。

综观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每个时代都在各自的学术情境中努力描摹考古学的面貌,对考古学与金石学关系的辨识,本质上也是对中国考古学的理解。对考古学与金石学关系的讨论,伴随中国考古学产生与发展,直至今日仍屡获新意^[32],而对二者关系认知历程的考察,则构成认知史或思想史视阈下研究中国考古学史的一种路径。

注释

- [1] 陈星灿:《中国古代金石学及其向近代考古学的过渡》,《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郭妍利:《就青铜器谈金石学与考古学的关系》,《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刘毅:《从金石学到考古学》,《华夏考古》1998年第4期;沈颂金:《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变》,《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4期;闫志:《金石学在现代中国考古学中的表达》,《华夏考古》2005年第4期;陆锡兴:《从金石学、考古学到古代器物学》,《南方文物》2007年第1期;查晓英:《“金石学”在现代学科体制下的重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 [2] 关于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时间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以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的发掘为标志;其二,以1926年李济在山西阴村的发掘为标志;其三,以1928年“中研院史语所”的成立和安阳殷墟的发掘为标志。本文从后者。
- [3] 外国学者因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及发现,将之称为中国考古的“黄金时期”。
- [4] 钱耀鹏:《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特点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98年第1期。
- [5] 张光直:《时间与传统·序言》,《时间与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4页。
- [6] 巩启明、肖宇:《勤思敏行 道德文章——巩启明先生访谈录》,《南方文物》2015年第4期。
- [7] 李济:《中国考古小史·李序》,《中国考古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页。
- [8] 陈胜前:《当代西方考古学范式研究述评》,《考古》2011年第10期。
- [9] 加拿大学者布鲁斯·特里格所著《考古学思想史》,为我们从思想史的视角观察考古学发展历程树立了典范。陈淳:《考古学史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读后感》,《南方文物》2009年第1期。
- [10] 梁启超:《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晨报副刊》1926年第61期53号。
- [11] 梁启超:《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晨报副刊》1926年第61期53号。
- [12] 陈洪波:《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述评》,《中原文物》2010年第6期。
- [13] 陈洪波:《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9—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6页。
- [14] 傅斯年讲,王培棠笔记:《考古学的新方法》,《史学》1930年第1期。
- [15] 傅斯年讲,王培棠笔记:《考古学的新方法》,《史学》1930年第1期。
- [16] 傅斯年讲,王培棠笔记:《考古学的新方法》,《史学》1930年第1期。

- [17] 蔡元培：《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序》，《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第1页。
- [18] 蔡元培：《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序》，《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第1页。
- [19] 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页。
- [20] 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5—6页。
- [21] 《中国考古学史》为阎文儒遗著，刊布于2004年，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末。查晓英：《“金石学”在现代学科体制下的重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 [22] 阎文儒：《中国考古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 [23] 徐玲：《留学生与西方考古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 [24] 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第103—128页。
- [25] 肖宇：《李济对考古学与金石学关系的认识及相关问题研究》，山东大学“青年考古论坛”，2015年5月。
- [26] 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李济文集》（卷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3—204页。
- [27] 刘斌、张婷：《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报告中遗物分类思想的演变及其背景分析》，《文物》2010年第10期；毕德广：《李济考古学研究方法浅析》，《文物春秋》2015年第3期；黄可佳：《早期中国考古学的两种器物分类和研究模式——以殷墟与斗鸡台为例》，《殷都学刊》2015年第4期。
- [28] 唐际根、曹音：《张光直谈中国考古学的问题与前景》，《考古》1997年第9期。
- [29] 〔美〕洛沙·冯·福尔肯霍森著，陈淳译：《论中国考古学的编史倾向》，《文物季刊》1995年第2期；赵辉：《考古学与中国历史的重构：为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五十周年而作》，《文物》2003年第1期；朱凤瀚：《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历史研究》2002年第7期；张海：《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特征与传统》，《华夏考古》2011年第4期；赵辉：《怎样考察学术史》，《考古学研究（九）：庆祝严文明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820—835页。
- [30] 李济：《〈田野考古报告〉编辑大旨》，《李济文集》（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2—333页。
- [31] 肖宇：《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公众性事件及其启示》，《中国文物报》2015年10月23日第7版。
- [32] 陈胜前：《当代西方考古学研究范式述评》，《考古》2011年第10期；陈胜前、李彬森：《作为科学的考古学》，《东南文化》2015年第2期；霍巍：《中国考古学的古典主义传统及其当代意义》，《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